

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马奇

ZHONGGUO

WENHUAYU

BEIJU YISHI

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张法著



美院图书馆 80016834

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张法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7.375插页2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0 000 册数：1-4 000

●
ISBN7-300-00533-0

B·76 定价：2.10元

MS12/20

编 者 的 话

为推进美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决定共同编辑出版“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不仅思维领域有所开拓，而且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这无疑是对我国美学教学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但是，如何使美学的研究与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地吸收、融化到美学教学中去，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形态的美学学科体系，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个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目前，国内有关美学方面的丛书已有多种，但选题范围大都限于某一特定方面，很少考虑到美学教学的需要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正是旨在补这方面之缺。丛书不要求系统性，无论是史是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近代的或现当代的，只要有助于教学与学科建设，都属本丛书的选题范围，形式不拘一格，著、译、编、选、探讨、论辩均无不可。当然，在内容上将力求

有所创新，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同时在文风上具备符合美学本性的生动性、可读性。

本丛书将分批陆续编辑出版。我们期望编、著者的共同努力，对我国的美学教学与研究、美学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所有编入本丛书的著作，如有不自知其片面、谬误之处，愿望读者批评、指正。

马 奇

1988年4月19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引论：中国悲剧意识的理论确认	1
一 悲剧、悲剧性、悲剧意识	1
二 人类的悲剧性	3
三 宗教、哲学和悲剧意识	5
四 悲剧意识的含义	7
五 文化性质和悲剧意识的形态	9
第一章 中国文化与中国悲剧意识	11
第一节 儒家理想和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层面	12
第二节 中国天道观与中国悲剧意识的基本层面	16
第三节 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与中国悲剧意识的 多义性	22
第四节 二人关系与中国悲剧意识的核心精神	25
第五节 集体的主体性与中国悲剧意识的基调	27
第二章 中国日常悲剧意识的基本模式	31
第一节 恋爱悲剧意识模式	33
一 《蒹葭》模式——追求者之悲	33
二 《将仲子》模式——被追求者之悲	39
第二节 “游”的悲剧意识模式系列	45
一 伤别模式	46
二 乡愁模式	51
三 闺怨模式	59

四	思念模式	66
第三节	怨弃悲剧意识系列	69
一	夫弃之怨	69
二	君弃之怨	74
三	世弃之怨	78
第三章	屈原与中国政治悲剧意识	85
第一节	屈原的产生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85
第二节	以日常悲剧诸模式表现政治悲剧内容	95
第三节	屈原与忠奸之争悲剧模式	108
第四节	屈原悲剧的文化意义	123
第四章	天道悲剧意识系列	131
第一节	历史悲剧意识	131
一	亡国之悲模式	132
二	盛世之悲模式	142
第二节	自然悲剧意识	154
一	悲秋模式	154
二	伤春模式	159
第五章	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168
第一节	仙	169
第二节	自然	179
第三节	酒	195
第四节	梦	209
余论：	中国悲剧意识运行的总趋势	221
后记	228

引 论：

中国悲剧意识的理论确认

一 悲剧、悲剧性、悲剧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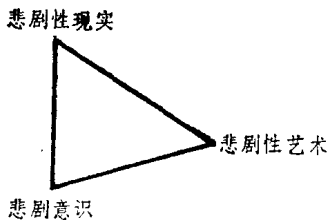
中国悲剧意识这个题目会使人产生疑惑。其原因在于“悲剧意识”这个词的西方起源给对该词的理解带来的错误导向。因词寻意，人们马上想到西方悲剧和由悲剧建立起来，波及整个艺术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具有特定的内容、形式、特征的悲剧意识。更狭隘者，则只想到悲剧和与悲剧不可分的悲剧意识。因此，要使我们的概念获得应有的理解，首先需对悲剧、悲剧性、悲剧意识这三个概念进行辨析和解释。

悲剧是一个戏剧种类，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悲剧反映的是现实悲剧性。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又是超越悲剧的，它也可以表现在其它艺术形式里面：雕刻（如《拉奥孔》）、绘画（《贺拉斯之誓》）、音乐（《命运交响曲》）、小说（《卡门》），各种艺术都可以表现现实的悲剧性。在西

方文化中，特别是在古希腊，现实的悲剧性在悲剧这一艺术种类中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因此就以悲剧来命名了（日常用语中往往以悲剧代替悲剧性。如对现实的不幸之事往往说，这是一个悲剧。在评论小说、绘画等非戏剧时也说，“这是一个悲剧”。这里，实际上指的是：这是一个悲剧性事件。但任何人通过一定的上下文关系，就清楚其所指。对此我们与其用科学语言学派的方法来清洗其意义的含混不清，不如用日常语言学派的“用法即意义”来领悟其实指）。

悲剧性在现象形态上有两种：一是现实的悲剧性，一是艺术中的悲剧性。既可说，这是二而一的东西；又可说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作为文化意识之一部分的悲剧意识，只要是成熟的，都有自己的形态、结构和内容，它的载体是文学艺术。西方的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悲剧上。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到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表现了西方文化悲剧意识的核心内容及其丰富的展开。中国文化中，戏剧在元代才出现，叙述性小说在明清方大盛。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由于中国文化以诗文为艺术的最高价值，而元以前主要是诗（词、曲、骚、赋皆诗之变衍），元以后诗的地位也未曾降低，倒是戏剧小说总是在与诗拉关系，相比拟，想攀附上来。因此，中国的悲剧性艺术不是以戏剧而是以诗为核心的。似可说，在典型地反映悲剧意识上，西方为悲剧，中国则为悲诗。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处在一个三角形内：



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也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它具体表现为悲剧性艺术。悲剧性艺术既是悲剧性现实的反映，又是悲剧意识的表现。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中国的悲剧意识，它的形态、结构、内容、意义，因而必须结合其所反映的现实和其具体表现物——艺术来进行。但谈现实和艺术的目的都是为了弄清悲剧意识。

进入正题前，还必须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悲剧意识，这个提问的背景，如本文一开篇就暗示过的，就是西方悲剧意识中心论。即以西方的悲剧意识为标准来衡量其它的悲剧意识。我们应该超越这个标准，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准。在这个更高的标准下，既使中国悲剧意识得以成立，又使西方悲剧意识毫无所损。这个更高的层次就是人类的悲剧意识。

二 人类的悲剧性

谈人类的悲剧意识须从其所由产生的客观存在，人类的悲剧性切入。现代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归结为挑战与应战。这恰好很适合用来说明人类的悲剧性。挑战，即人的生存受到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应战，即人对这种根本性的威胁和压力进行了有效的斗争。冰河期结束之时，欧洲大陆上冰川收缩，大西洋的气旋地带再度向北移动，使非洲草原出现了逐渐干旱过程。当地的狩猎居民的生存受到了挑战，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追随他们所习惯的气候环境和他们的猎物向北或向南迁移；二是留居原地，靠他们所能猎获的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强过

活；三是仍留原地，但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来寻求生存。在这场对付干旱的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不改变居住地点，也不改变生活方式的人灭亡了。那些没有改变居住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由猎人转为牧羊人，逐渐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那些愿意改变生活地点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一些随气旋区的北转而向北移动，其结果在无意中遇上了新的挑战：北方严寒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凡是没有被压垮的都在身上产生了一种新的适应能力。另一些人向南撤退到贸易风区域。这里热带的单调气候令人昏昏欲睡。有历史意义的是有些人对于干旱挑战的反应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正是这些人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古苏末文明^①。在汤因比看来，只有最后一种算是应战。汤因比的应战，意味着（一）应付了挑战；（二）借着挑战使自身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人类文明就是在对挑战的应战中诞生的。然而，现在我们已无法从各种选择的行动本身和行动的后果上判断其性格的勇怯、意志的强弱、思虑的深浅。那些留居而走向灭亡的民族，可能有更强的意志、更大的毅力、更坚强的自信，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过更勇敢悲壮的斗争。给人的生存带来根本性威胁的挑战本就具有非常规性、非预料性，它的出现是在人的已有知识和认识之外的，它对人的把握能力显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另一方面，人对挑战的斗争并不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斗争，而是一场前途未卜的斗争。人们的斗争武器是生存本能加知识加信仰。这种斗争的精神力量或曰指导力量具有一种超越理性的性质。挑战的非理性和应付挑战的超理性相加就是人类的悲剧性。人类的悲剧性决定着成功的概率性。一些人在悲剧中失败、沉沦、灭亡；一些人在悲剧中

^①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87页。

诞生、前进。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在无数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非洲的干旱诞生了埃及文明；洪水的灾难冲刷出苏末文明；热带森林的压力迫出了马雅文明；海洋的挑战卷托起米诺斯文明，……。人类的文明就是在挑战与应战的悲剧性中诞生的。但悲剧中的诞生远不是一劳永逸地摆脱劫难，马雅文明终于被热带森林所吞没；锡兰文明在灼热的平原上死去；皮拉特文明和巴尔米拉文明遭沙漠围灭；复活节岛文明在海洋的威力下消逝。文明的成长仍然伴随一串串悲剧性的挑战和应战。重要的差别是，文明的诞生中，挑战与应战主要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文明的成长中，挑战与应战不仅在人与自然之间，更主要地是在人与人之间，在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希腊文明的发展史就充满了多样性的挑战和应战。有城邦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斗争，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有各城邦之间的斗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之间的斗争：三次波希战争。看看四大文明的兴衰史，再看看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史，人类在夺取财富、领土、荣誉中有过多少悲剧性的崇高精神，在保卫自身，抵抗侵略中激起过多少壮烈的悲怆情怀。文明就是在挑战和应战的悲剧性中夭折和成长，沉沦和前进的。

三 宗教、哲学和悲剧意识

现实的悲剧性并不一定总会随之产生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悲剧意识。悲剧意识的形成意味着对现实的悲剧性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有一种正确的感受和把握。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很容易使人对悲剧性进行一种宗教的把握。宗教使人在现实的悲剧性面前保持一种超然的

宁静和虔诚的坚定。成功了是主的荣耀和恩宠，失败了是主对吾人的考验，或是对自己以前罪孽的一种惩处。如果自己毫无过失，那么就是祖先的过失或始祖的原罪，自己则为之赎罪，自己应当无所怨悔地接受失败甚至毁灭。在这种宗教把握中，约伯的牛羊被人掳去，儿女被倒塌的房屋压死，他无所谓，“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字是应当称颂的。”他得了重病，全身长满了毒疮，仍毫无怨言：“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么？”^①亚伯拉罕要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献给上帝的时候，心池没有荡起一丝情感的漪涟。

悲剧意识的形成需要一种理性的前提。只有理性才能使人驱散宗教的超然和麻痹，使人直面严酷的现实，使人深切地感受到现实的悲剧性。在第一批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只有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形成了巨大的理性主义潮流，产生了众多的世界性的哲学家。从而也建构起了完整的悲剧意识。在古希腊，其代表是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比德斯的作品。在中国，就是《诗经》中的悲诗和《楚辞》。

理性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前提，只有沿着理性之路前进，才会抵达悲剧意识。但悲剧意识的产生却是对理性叛离的结果。人对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一句话，对现实的悲剧性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想从理性上给予把握。但人生的悲剧性是理性所把握不了的。理性是建立在一定的时代的人的实践力量的总和之上的，受历史局限的，人生的悲剧性却有超时代的性质，它本是时代难题的暴露。想把现实的一切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时代理性，当然解释不清本来就解释不清的事情。狄克逊说：“只有当

^① 参见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227页。

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①须补充一点，作理性把握既未成功，在理性氛围的主潮中又回不到宗教把握上去（宗教也以信仰的方式把困惑解释清楚了），这时候就能产生悲剧意识。而文艺以其既非逻辑所能穷尽，又非信仰所能容括的特性恰好成为悲剧意识的物质载体。

在某种意义上，悲剧意识是反哲学和宗教的，但它不是反文化的。悲剧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与哲学和宗教一道，服务于所由产生的文化社会。只是与哲学和宗教比起来，它具有更大的促使文化更新的力量。

四 悲剧意识的含义

如果要对悲剧意识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似可说：悲剧意识是由相反相成的两极所组成的。（一）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

（二）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②，就暗含了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严肃，即陷入了困境，受到了挑战。一定长度，意味着把这种困境给予艺术以形式化。人给困境一定的形式，人就把握住了这种困境。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③“意有所

① 转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212页。

② 《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页。

③ 《史记·屈原列传》。

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①所谓，“穷”、“郁结”即陷入困境。而《离骚》的写作，又给这种“忧愁幽思”以一定形式，把握住了这种情感。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效果是通过恐惧和怜悯之情的激发而达到一种情感的净化，主要从悲剧意识的弥合功能讲。钟嵘《诗品序》说：“凡斯（现实的悲剧性）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使贫贱而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也。”也着重在弥合功能。由悲剧意识（一），即其暴露困境的功能，使人们对现存的东西产生怀疑和询问。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推动进步的力量；由悲剧意识（二），即其弥合功能，使人们对困境产生一种韧性的承受力，这是悲剧意识具有的保持文化生存的巨大力量。由悲剧意识（一），它是反哲学（理性、统一、逻辑）的，反宗教（信仰、统一、道德）的；由悲剧意识（二），它又是弥补哲学和宗教的。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始，能够完整地发展到今天，并成为人类前进的火车头，与其有成熟的悲剧意识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能够毫无间断地延续到今天，也是和中国文化具有成熟的悲剧意识分不开的。在世界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创造了成熟的悲剧意识，也只有这两种文化得到了系统的、丰富的、持续的发展。成熟的悲剧意识意味着文化的悲剧心理机制的确立。它使文化能够顺利地应付成长中的悲剧性。

人类的悲剧意识是由暴露和弥合这两个相反相成的功能场所构成的。具体的悲剧意识因其具体的原因或偏于暴露困境这一极，或偏在弥合这一极，但都处在这两极的作用范围之内。初一看来，似乎西方悲剧意识偏于暴露困境，中国悲剧意识则重弥合困境。从形态学来看，这也是不错的。但重要的是应从中西文化的性质差异和悲剧意识对文化应起的作用来认识中西悲剧意识的

^① 《史记·司马迁自序》。

形态差异。

五 文化性质和悲剧意识的形态

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文化的成长，从而文化的性质就决定了该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形态。西方文化是一个在剧烈的斗争中发展进步的文化。从古希腊始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真是真，假是假，来不得滑头。欧几里德几何，公理、定义、求证、推理，绝不容含糊。实验科学更是钉是钉、铆是铆，都充满了一种刚性。荀子说：“强自取柱”^①。柱，折也，断也。太硬的东西就容易折断。西方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地毁灭和新生的历史，文化的重心不断地转移：希腊、罗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学说上也是不断地一个否定一个。浮士德的追求精神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神，黑格尔的哲学思辨更能反映西方精神。西方文化不就是在不断地追求、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发展的吗？西方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帮助文化成长的西方悲剧意识的形态。它描摹故事，是悲剧；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刚勇地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在否定前进的文化中，只有悲剧能弥补哲学、宗教之不足，使人承受毁灭，询问毁灭，不断发展。黑格尔说，在双方的毁灭中是绝对理念的胜利。西方悲剧是有助于西方文化的进取性的。

与西方不同，建立在农业社会和血缘宗族制度上的中国文化是内陆型的。它的政治思想是稳定，它的哲学理想是中和，它不

^① 《荀子·劝学》。

是一种进取性，而是一种保存型的文化，“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的气质与西方文化比起来，显现为一种柔性，一种韧性，荀子说：“柔自取束”^①。束即放不开，没有超越性。中国文化本身就不需要超越，不需要标新立异，而就是要“束”，要稳定，要延续，要保存。为了使这种保存型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悲剧意识是柔性的，是内心的，是情感的，是悲诗。中国悲剧意识作为悲剧意识，它也暴露文化的困境，它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强烈的询问和怀疑。但作为文化的悲剧意识，它又弥合着这种询问和怀疑。与文化的其它意识一道，保存着中国的保存型文化。

中西悲剧意识虽有着形态、特征、内容、韵味的差异，但二者都一样具有悲剧意识的两种功能（暴露困境和弥合困境），也都同样地帮助着各自文化的生长。在悲剧意识与文化的关系上，二者也是同构的。因此，中国的悲剧意识虽然似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悲剧意识，但仍然完全算得上悲剧意识。研究中国的悲剧意识，能够丰富人类的悲剧意识，更深地理解西方的悲剧意识。对我们今天来说，更感兴趣的，可能是通过具有暴露困境的询问和怀疑功能的中国悲剧意识的研究，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

① 《荀子·劝学》。